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外国名著

《战争与和平》：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

□王 雪

习近平总书记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的名著和文学家如数家珍。据《习近平在正定》记载，他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同陆树棠等友人谈论俄国文学，大家聊到托尔斯泰，习近平说：“哪个托尔斯泰？”陆树棠愣了一下，心里想：习总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大名？习近平接着说：“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是剧作家和诗人。”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间，他更喜欢托尔斯泰，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高尔基说：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战争与和平》正是这位文坛泰斗的代表作，创作于1863—1869年，耗时6年，共百万字。故事以皮埃尔·别祖霍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为主角，以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个贵族家庭的兴衰荣辱为线索，通过对500多个人物和无数场景的塑造刻画，真实再现了1805年至1812年俄、奥、法三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及由此引发的俄国人民卫国战争。在小说里，作者注重切换历史事件

画面和个人日常场景，在战争的刀光剑影间隙插入人民的生活画卷。从婴儿降临人间的第一声啼哭，到奄奄一息的老人情感最后的迸发；从窃取自己同伴钱币的小偷的心理，到英雄主义崇高的冲动和透彻的领悟，书中应有尽有。

正如罗曼·罗兰对《战争与和平》的赞誉：“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是现代的《伊利亚特》。”然而，尽管同为史诗，托尔斯泰却摒弃了传统史诗以塑造某个英雄人物为中心任务的写法，将《战争与和平》书写成一部没有特定英雄人物的现代史诗巨著。因为他坚信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不来源于那些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即使是沙皇亚历山大、凯撒大帝、拿破仑。书中有这样一条故事线索：拿破仑亲率六十万大军向俄国不宣而战。1812年9月，俄军在战争失利撤离莫斯科后在周边展开运动战，以阻挡法军向南进军，并从侧面威胁敌人，以达到切断其后方联系的目的，还同时补充军队准备反攻。在敌占区，俄国人民则广泛开展游击战，致使法军四面受敌，最后弹尽粮绝。随着严冬逼近，拿破仑企图向南撤退寻找粮食和住所，被迫于10月19日放弃莫斯科，结束了长达一个多月的烧杀掳掠。拿破仑军队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俄军和游击队追击，最终于12月底带着三万残部逃回巴黎。托尔斯泰实际是在这样一段史实描写中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是

来自严寒饥饿这种自然因素吗？不，如果进行合理分配不肆意劫掠，拿破仑军队在莫斯科可以弄到足够食用半年的粮草，及全军过冬的衣物；是来自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的英明领导吗？不，不论是原地按兵不动，还是撤退保存实力，他的决策大概率都会遭到沙皇亚历山大的反对，以及以参谋长别尼生为首的权斗碾压；是来自拿破仑的决策失误吗？不，他从进入莫斯科到逃出莫斯科，所发布的军事、司法、外交和行政等命令都没有漏洞，而且他这一时期的指挥能力与在埃及、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并无二致。

托尔斯泰以细腻的笔触试图启发读者意识到，这股能够凌驾于皇帝、统帅之上的力量，来自于无数个皮埃尔式的贵族，他们拿出巨额财产招募组建民兵团，甚至鼓励家奴参军；来自于无数个安德烈式的军官，他们放弃优渥生活为祖国而战，不惜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还来自于无数个娜塔莎式的女性，她们关心将士疾苦，甘心为他们服务，宁愿舍弃财物也要将马车腾出来转移伤员；更来自于千千万万面目不清、不知姓名的群众，他们踊跃参军、组建游击队，在世代耕种劳作的土地上流血牺牲、痛击侵略者。这股将皇帝拉下马的力量，是士气，更是民心。从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到下级军官士兵，再到广大人民群众，从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员到杀死数以百计侵略者的村长之妻，还有俘虏数百名法军士兵的教堂执事，以及亲手放火烧掉自己店铺的商人，他们不是作为单个

的英雄人物在行动，而是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去打击侵略者。人民群众组成了一个英雄集体，在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下以英雄群像出现在作品中，从而使作品表现出现代史诗更为恢弘的气魄。

托尔斯泰曾表示他要写的正是“人民的历史”。《战争与和平》的伟大之处在于突出了人民和人民战争的思想。由于拿破仑入侵所引起的卫国战争，使整个俄罗斯民族各阶层都被调动起来。在祖国前途命运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人民奋起抗争，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小说深刻地刻画和揭示了人民是历史进程的接受者，是对游牧民族在价值理念上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交流、交往、交融正在走入“深水区”。以海纳百川的情怀兼容华夏大地乃至域外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兄弟之邦的情谊对待戎狄蛮夷。大一统的格局在隋唐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图景。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文学作品，更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告诉我们相较于那些名垂青史的所谓“大人物”，人民群众身上与生俱来的朴素的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推动历史滚滚向前的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书写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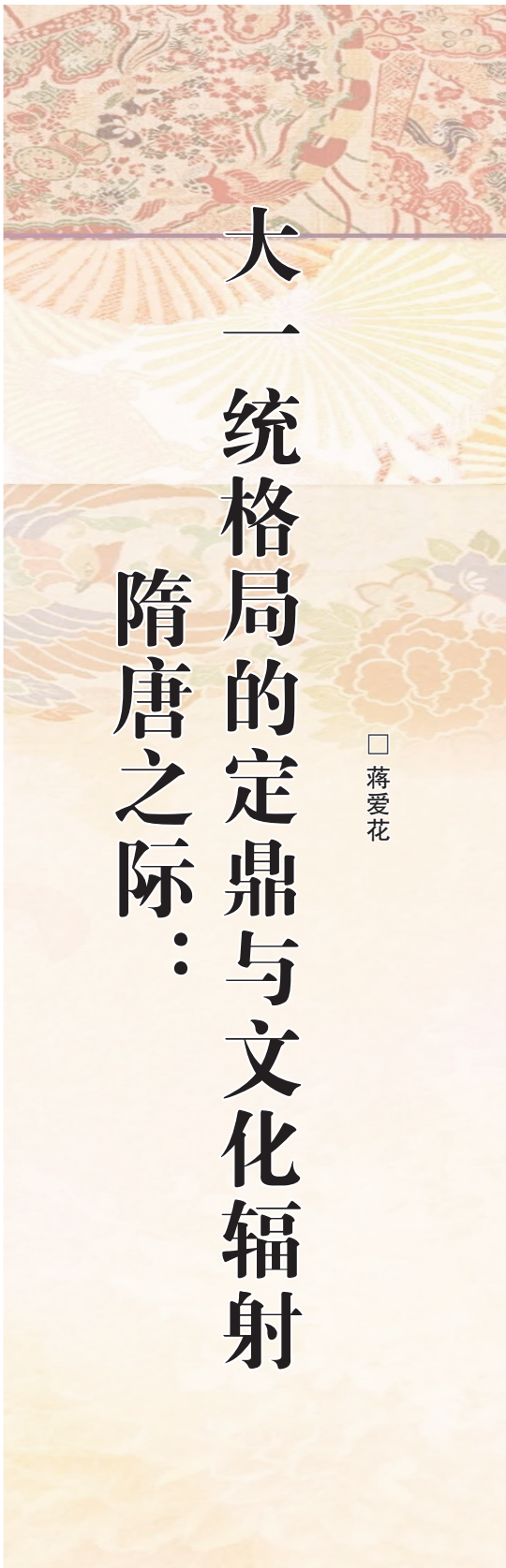
（上接1版）

整体推进，系统施策，促进中药生态农业协调发展。中药生态农业注重整体、协调和循环发展，将立地环境作为孕育优质中药材的载体。中药材种类繁多，生境多元，广泛分布于农田生态系统甚至整个生态系统中。在中药生态农业发展中注重统筹中药材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关系，根据中药材的生态位，在不同系统层次上梳理我国常见中药材的基本生态种植模式。通过生态景观层次上的景观模式、生态系统层次上的循环模式、生物群落层次上的立体模式、生物种群层次上的生物多样性模式以及生物个体层次上的良种良法模式有力促进了生态农业综合效益提升。

强化法治思维，保障中药生态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中药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药与粮、药与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一度成为制约中药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中药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林草中药材生态种植、一地多用，有效防止了耕地“非粮化”和“林草退化”，化解了中药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极大地减少了相关违法乱纪行为，在主观和客观层面强化了人民群众的法治理观。

提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落实“双碳”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中药生态农业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间作和模拟栽培等技术手段积极投身“双碳”工作，在利用干物质累积固碳增加碳汇的同时，通过减少投入而极大降低碳排放，降碳效果十分显著。此外，通过建立中药生态农业碳汇补偿机制，还可以更好地发挥中药生态农业的生态功能，并通过生态功能助力经济功能提升。

【作者分别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大一统格局的定鼎与文化辐射
隋唐之际：

□蒋爱花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理念的“华夷一体”的族群观。这一理念可以细化为：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文化观。隋唐时期，政治格局上的大一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以较强的时代特征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毋庸置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隋唐时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鉴往知来”的作用。

疆域与边界

自战国以来，“九州”即成为古代中国的代称，这是早期先民的一种基于地理认知基础上的政治理想。《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将“地理”作为单独的分类，这不仅是地理学的起源，亦是“先王之化民”的政治因素使然。

受政治上空前大一统格局的影响，隋唐时期的史学著作撰述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已自觉地为统治者“总揽天下大势”提供参考。唐初，《隋书·地理志》在这方面有较多的探讨，它指出，“体国经野，以人为极”“分疆画界”是政治统治的传统。到了中晚唐时期，杜佑在《通典》中提出：地理的作用在于“撮机要”，而非单纯的“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等记述性工作；政治统治的关键在于“四夷从化，即人为治”的道德理想，疆域与统治的关系为“患在德不广，不患地不广”。

古代中国的地域辽阔且边界界定多以自然天险为分隔，极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物产和地理优势成为优先发展的客观条件，它们在早期史学著作中得到了相对详细的记载。但是，随着民族融合与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了解与交往也进一步加深。随之而来，崇尚民族纪事的历史记述，其范围自然而然地有了大规模的扩展，新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的活动得到了“大一统”理念关照下的准确反映。在史书中，我们看到了乌桓、鲜卑、蠕蠕、氏、突厥、铁勒、芮芮虏（柔然）、吐谷浑、奚等民族的史传类目，这是此前不会出现

政治与正统

正统是古代政权存在的理论基石。民族矛盾凸显时，正统论会有不同的意涵。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民族以及建立的政权都曾努力争取合法性，竭力以“中华正统”自居。《晋书》创立了载记的体裁，分别将前赵、后赵、前燕、后燕等十四个政权，只称呼为僭伪，而不辨华夷，“既具本纪之纲领，复有列传之委曲”。其巧妙之处在于，既解决了以汉族为正统中心的不可质疑性，也厘清了民族割据状态下写入同一正史的单向逻辑。针对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动荡的历史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从早期正史中提出的“五胡乱华”，到民族史学者所提出的“五胡治华”，乃至“五胡兴华”。“乱、治、兴”这三个感情色彩逐渐提升的字眼，体现出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的肯定性评价：既孕育出民族融合的萌芽，也悄悄培育出大一统的萌芽。

大一统思想中包含着正统观念，正统观念是指能够统一全国的某个政权所具有的承袭于华夏文化的合法性。来自塞内塞外、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大迁移，在带来关系重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在多民族的中国处于多个政权同时并立的历史时期，正统观念是统治者和史书编撰者热衷讨论的话题。唐修“五史”较好地贯彻了“华夷一家”的理念。唐高祖李渊以“胡越一家”为自豪，唐太宗李世民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华夷平等、胡汉一家的看法，既是对当时庞大局面的讴歌，也是自信心态的流露。

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观念逐渐成为人们共识。唐初修撰的《隋书》，首次按照方位梳理了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将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民族分立与统一的问题融入到了“经略四方”的雄心中。这体现在处理民族关系的两大原则上：一是从早期的“华夷之辨”到“以夏变夷”的主张；二是中央逐步推行羁縻政策、和亲联姻、纳质宿卫、互市贸易，在必要时候，也不排斥武力征伐。

在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政权的建立者并非都是汉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也渴望实现“天下之主”的政治秩序，即正统。“中华”与“夷狄”是可以转变的，刘渊曾以“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如果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间脉络来看，隋唐时期的地

位得到极大的重视，包括民族历史、民族习俗、民族政权等，特别是“华夷之辨”强调“无隔华夷”，展现了民族关系在曲折演化中走向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向。

文化圈的形成与辐射

在中国古代，“皇帝”作为中原政权元首的名号，得到其他各民族的认可，因为这代表着道统、法统、治统的至高无上。中原人民对“天可汗”的接受，是对游牧民族在心理和思想上的接受，这意味着各民族之间在价值理念上实现了深层次的融合，交流、交往、交融正在走入“深水区”。以海纳百川的情怀兼容华夏大地乃至域外各民族的思想文化，以兄弟之邦的情谊对待戎狄蛮夷。大一统的格局在隋唐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图景。

在域内，唐朝刚刚建立，新成立的吐蕃政权与唐王朝存在互相试探的态度，唐高祖李渊提出了“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宣与和亲。”唐朝的和亲性质，与汉代迫于匈奴的军事压力而开展的和亲迥然有异。通过和亲，不仅可以加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文化认同，而且可以换来较长时期的和平，可以促进彼此价值理念的同行、同化。松赞干布求娶文成公主的故事，在官方史书新旧《唐书》的《吐蕃传》中，细节记载虽然不多，但体现出吐蕃对大唐繁荣强盛的倾慕。松赞干布曾经不无骄傲地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松赞干布作为当时实力强大的吐蕃首领，将大唐视为“天朝上国”，说明对于大唐“天下共主”的认可。与和亲的有效性限于皇室不同，移民则成为民间的自发行为。仅贞观年间，移民中原地区的突厥、契丹等民族人口即有六七十万。此外，中亚、西亚地区的人亦蜂拥而至，使节、商旅、僧人、贵族往来穿梭，在为唐王朝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思想的碰撞更加活跃。具有开放包容精神的中华文化在接触异质文化后，有甄别地选择吸收、除旧布新，使本土文化兼容并包、大放异彩。

在域外，唐王朝在政治生活中对待非汉民族持完全开放信任的态度，换来的自然是非汉民族对王朝的强烈认同。《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旧唐书·李大亮传》：“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对于域外关系的认知，形象地体现出唐人刻到骨子里的

自信。这种自信恰恰是从先秦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大一统”的观念，依托帝王之序，融入到了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官员作为统治群体中的精英，其来源反映了国家取才用人的态度。有些外国朝贡使者，在长安或洛阳等繁华都市居住数十年而未归，唐朝政府让他们自愿选择归国还是留在大唐。《资治通鉴》记载：“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事实上，“胡客无一不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寺）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自主选择留下的一部分胡客被安排进了唐王朝最重要的禁军——神策军，说明唐朝民族融合程度之深以及民族成分观念之淡薄。2004年，西安出土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也为这一图景提供了生动的注脚。《井真成墓志》记载，36岁的井真成“衔命远邦，驰骋上国，蹈礼乐，袭衣冠”，被授予“尚衣奉御”，尽管这或许只是象征荣誉的赠官，依然显示了对于“非我族类”的充分信任。

唐律规定：内附各族及外国人与唐人婚配所生子女，均为大唐百姓。那些来自异族和域外的人们乐意与唐人结婚，意味着自愿放弃原有的身份成为大唐的臣民。长时间居住在中国，这些异族与域外人士早已实现了“华夏化”。无论是语言、习惯、观念还是心态，业已融入了大唐，大唐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陈寅恪指出：“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角度看，隋唐结束了南北对立割据的局面，由分裂纷争状态下走出来的民族更容易迸发出开放包容的精神，更容易海纳百川，更容易创造出“和而不同”的新局面。隋唐王朝的大一统格局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冲突为主的基调，进入了众族融合的新时代。“和而不同”的理念，不仅促进了多民族共融局面的开创与拓展，也使得“胡汉一家”的思潮得以流行。隋唐时期的族群血缘、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的深度融合，不单以政治集团之间的对立、冲突或武力征伐而停滞，这正是中国在经历近四百年的分裂对立之后，依然能够建立规模庞大、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统一王朝的原因。强盛如隋唐者，在千余年形成的民族融合基础上，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到了行政版图中，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定鼎的作用。凭借先进的制度、强势的国力、多元的文化，国家治理的格局以别具风采的“大唐气象”辐射到了更远的异域与他乡。